

第 部分

古典基础

古典政治经济学的高峰时期大约从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国富论》出版起，至 1848 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John Stuart Mill）的《政治经济学原理》出版时为止。这同时也是欧洲以极度的垄断和特许形式为特征的商业资本主义发展，并最终让位于工业资本主义的时期。两个多世纪的尘埃并没有掩盖住古典经济学思想家所发现的关于社会组织的真知灼见。高峰期的古典经济学家们之所以能够看得很远，是因为他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要想评价古典货币理论，我们必须要考虑约翰·劳尔（John Law）、大卫·休谟（David Hume）和詹姆斯·斯图亚特（James Steuart）的著作。

古典政治经济学产生的背景是美国与法国革命。然而，它却产生于英国，这个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就已经开始了政治革

命的国家。共和主义、人权、资产阶级税收和公共财政已经开始向整个世界传播。同样重要的是，英国工业革命在 18 世纪后大约 25 年已经开始，并清楚地划分了现代社会的三个阶级：资本家、工人和地主。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把社会总产出相应地划分为利润、工资和地租。

在思想领域，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必须要反击重商主义。作为一种经济思想，重商主义统治欧洲长达两个多世纪。早期的重商主义倾向于把国民财富等同于金属货币，并主张限制进口，以阻止货币流向国外。后期和更加成熟的重商主义主要试图分析贸易条件，以便能够确保国际收支盈余和货币净流入。这两种学派都没有认识到自然秩序在经济体系中的功能。相反，重商主义思想的目的是要寻找国家干预经济生活的规则和条件。古典经济学对于重商主义的供给建立了一个原则，即主要由商品构成的国民财富并非产生于贸易盈余，而首先是劳动。古典的重商主义者认为，价值是由交换阶段的供给与需求来决定的。而古典政治经济学家者认为，价值是由生产过程中的劳动的支出来决定的。劳动价值论提供了价值决定“生产成本”的客观标准，并使研究的重心转移到生产领域。劳动价值论同样深深地影响到对于货币的分析，因为，货币的典型是加工过的商品：金和银。不具有价值形态的货币是同早期的信用制度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例如像私募发行的纸钞。这种形态的货币也广泛应用于国内与国际资本交换之中。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发展进程中，几乎同时产生了德国历史学派、新古典主义和马克思主义。^① 可以证明，在这三个学

参 见 Meek: (1950 年)。

派中，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从理论的联系方面是最接近于古典政治经济学的。其中最明显的是劳动价值理论。历史学派几乎反对政治经济学的所有理论原则；而新古典学派则主要采用主观边际效用论。马克思主义尽力地发展劳动价值论。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马克思建立了一个合乎逻辑的关于货币与信用的理论，同时也对古典学派对这些问题的处理进行了批判。

第 1 章

货币与信用的古典
政治经济学

关于货币与信用的古典政治经济理论是以一个基本假设为特征的，即自然的和谐普遍存在于市场经济运行之中，且这种和谐一直延伸至货币与信用领域。在该领域，古典经济学可以区分为两个明显不同的学派。一方面，货币数量论（或货币学派）强调商品的产出总量同商品货币的总量的和谐均衡，并论证，无论是在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还是在国际市场之中，均不需要政府或其他组织的干预。按照这一观点，货币在资本主义交换中是次要的，是实际经济活动的“面纱”。银行创造的信用能够扰乱可能存在的和谐，并导致商品价格的波动。因此，这一传统学派支持《1844 年英国银行法》的实施，并希望英格兰银行所实行的对信用货币数量的紧缩性管理能够减少资本主义的市场波动。

另一方面，反对货币数量论的学派（银行学派）则强调，只要银行贷款的支付是以非投机性为原则的，在商品产出与信用货币关系之间的和谐同样具有很大的可能性。为了能够支持

这些观点，该学派的经济学家不得不重新检验资本主义交换中商品的作用，并通过强调货币贮藏与支付的功能，反对货币数量论。由于这一原因，反货币数量论学派留下了更为丰富的、可以用来分析资本主义交换中货币现象的遗产。然而同时，该学派却在对于如何解决资本主义市场失常方面几乎没有留下有价值的理论与实践遗产。

本章将讨论这两个学派的渊源和主要观点。1.1 节讨论货币的产生、商品货币的度量以及商品同货币总量的关系等问题。1.2 节主要考察信用体系运行对于货币形态与功能的意义。

1 价值、商品与货币

1.1.1 价值尺度

在古典经济学家之中，^①亚当·斯密（1776 年，第 1 册，第 4 章）对货币的起源进行了早期与全面的讨论。斯密首先考察了劳动生产率增长根本原因的劳动分工。在一个复杂的劳动分工情况下，生产者必须用他们的一部分劳动成果同其他人的劳动成果相交换。然而，商品的直接交换常常“在其运行过程中受阻或搁浅”，因为生产者的需求具有明显的不相容的特点（同上，第 26 页）。这样，一个“谨慎的人”就必须保持“一定量的某种商品或其他种类的商品，例如那些他觉得几乎没有人会拒绝用他们的产业生产出的产品与其进行交换的商品”（同上）。贵金属由于其不易磨损性和可分割性而最适合这种要求。金属货币在开始阶段是根据其重量来计算的，但是由于每

次交换中产生的对金属的磨损和不可避免的搀杂使假，导致国家以重量为基础的铸币的出现。然而不久，硬币仅仅根据形式而不是重量进行流通，这样便建立起商品的名义价格。

于是，斯密从理论上把货币界定为一种商品，这种商品可以可靠地用来购买其他商品，并可以克服物物交换存在的问题。商品的名义价格显然是它们的交换能力的尺度。斯密（同上，第 34 页）进而区分了“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第一次权威性地阐述了古典交换价值理论，“因此，劳动是所有商品具有可以交换价值的真实尺度……所有物品的真实价格。对于想要获得任何一件物品的人来讲，他所花费的实际成本是他为获得它所付出的艰辛与麻烦。”在斯密的价值分析中，它是相当含混不清的，特别是在物化在生产过程中的劳动和在交换中被商品支配的劳动上更是如此。斯密交互使用这两个概念，在理论上并没有准确的定义，而这必将在涉及相对价格时产生矛盾的结论。然而，把价值同劳动联系在一起，对于斯密来说，是一个重大的突破，并成为古典理论的基石。斯密还对交换中固定不变的价值衡量标准进行了广泛的研究（主要是通过玉米来确定的）。由于货币的“实际”价格是受其生产条件变化的影响的，所以用来充当货币的金属不能成为这种固定不变的尺度。金属货币所能够起到的最主要的作用是建立“名义价格”，这种价格随着金属和货币中金属含量的价值而呈反方向的变化。^②

然而，除了区分“实际”（价值）和“名义”（货币）价格以外，斯密几乎没有涉及名义价格的计算体系，没有涉及它同货币价值及商品价值的关系。詹姆斯·斯图亚特爵士（Steuart），一个与斯密同时代，但确被不公正对待的重商主义

者，^③对于这一问题却有着非常深邃的洞察力。斯图亚特，尽管经过多种多样的尝试，并没有达到劳动价值论，但他却认为，价值和价格是由交换阶段的需求与供给来决定的。他的价格理论基础是计算货币的概念，“那种我称之为计算的货币仅仅是与它相同物品的专断尺度，被创造出来用以衡量可出售物品的价值”（Steuart, 1767 年，第 2 卷，第 270 页）。^④计算货币通过衡量可以出售物品的价值而建立起一个价格体系。从另一方面看，货币同时也是一种从未有人对其进行准确分类的金属，斯图亚特将其称之为“人为的或金属的货币”。金属货币是计算货币的近似物。由于金属货币的价值（由供给与需求来决定的）是可变的，所以这种货币并不能令人满意地实现由计算货币所建立的价格体系。金属货币必然只能成为理想的计算货币的不可靠的近似值。

斯图亚特指出，价格体系抽象的存在是经济理论的重大进步。不可否认，商品价值的确可以用很多不同种类的货币来表示，这些货币并不需要具体地摆放在人们的面前，以便能够使价值转化成价格。^⑤马克思，（1867 年，第 189～198 页）同样强调了那种可以把价值转化成价格的抽象货币和可以把价格转换成具体等价物的实际货币之间的区别。在资本主义交换过程中，抽象货币向实际货币的转换从来就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然而，斯图亚特分析中存在的问题在于，他把金属硬币当成抽象货币的实际近似值。虽然，硬币是一种社会约定的观点无疑是正确的。然而斯密在把硬币仅仅当作货币金属的一种习惯性划分，而非一种价值的抽象标准方面，比斯图亚特的基础更为牢固。斯密的劳动价值论使他能够以人类所付出辛劳的货币与商品生产为基础，断定商品与货币在交换中发生联系之前，

它们就已经具有了相同的标准。斯图亚特，由于缺乏劳动价值论，相反转向了另外一种观点，即抽象的计算价格体系产生于理想价值尺度时的专断的近似物。

1.1.2 货币数量论

然而，货币并不仅仅可以证明价格，同时也具有充当流通手段的功能。一个具有发达的劳动分工和自主经营权生产者的货币经济，例如资本主义社会，需要依赖不同种类的、健全的市场来为生产者提供投入要素，为工人和其他人提供消费资料。一个正常的，但并非有意识组织的、运用货币的商品交换同样必须存在，以便能够维持这样一种经济。在任何时刻，商品流都既进入同时也退出流通领域，分别地寻求卖出，或者已经卖掉并获得了货币。从这个角度讲，在任何一个特定的阶段，交换领域中的商品和货币的总量以及货币的流通速度显然都是重要的经济变量。而且，商品和货币的价值与数量必然同总价格具有联系。然而，要想全面地评价古典经济学关于这些问题的论点，我们必须首先考察休谟的货币数量论和斯图亚特对于它的批判。

大卫·休谟 (David Hume) 并没有太多地致力于对政治经济学的研究，但在几篇短文中却设法使后人能够抓住一个完整的货币学派的要旨。休谟的 18 世纪中叶的理论具有一个非常复杂的背景：约翰·劳尔 (John Law) 的 18 世纪 20 年代体系的崩溃” (该问题将在以后做进一步的讨论)；反对重商主义的斗争，包括后者把货币当作国民财富的本质的认识；伴随着西班牙人在新世界贵金属的发现而产生的，从 16~17 世纪持续的价格通货膨胀。休谟的理论并非由其独创 (其他人，包括

Cantillon 和 Montesquieu 比他更早讨论了相同的观点)但是他却给出了具有一致性与自觉性的货币数量论。

休谟(1752 年,第 48 页)认为,货币仅仅具有“虚拟价值”,是交换领域中“劳动与商品的代表”(同上,第 37 页)。货币的“虚拟价值”实质上是商品总量相对于货币总量的交换比率(价格水平的反比率)。而且,货币是一种纯交换手段,“仅仅是人们同意用来方便一种商品与另一种商品进行交换的工具”(同上,第 64~65 页)。休谟的理论涉及一个无法回避的国际方面的问题:货币在国家之间的流动就像水在水管中的流动一样,并在所有的国家之间寻找相同的“水平”(同上,第 64~65 页)。如果国内的货币数量由于某种原因,比如说银矿的发现,而增加了,货币同商品交换的比率就会受到一定的干扰。货币的价值会自然地下降(商品价格上升)。虽然,货币的国际“水平”依然会维持不变,然而,货币金属会流向国外,该国会出现国际收支逆差。当国际间货币再度达到其正确的“水平”时,动荡才会停止。当国内货币突然减少时,会出现相反的情况。休谟同时还把一个“转换机制”融合进他的基本价格——水平——铸币——流动理论。如果在短期,商人发现他们拥有比一般情况下更多的货币,他们就会增加其有效需求,雇用更多的工匠进行生产,并造成生产的繁荣。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相对于实际活动的短期繁荣会失败,产量会回到原先的水平,但是价格却更高了。从长期看,货币是对实际活动的“面纱”,在经济上具有中性。然而,这一迂回性的分析,尽管在现代文献中被认为是正确的,但是并非是休谟论点攻击的实质。李嘉图虽然本人最关心长期的结构,但却从来没有玩弄过这样的概念。^⑥

休谟的数量论公式具有一个有力的，但是完全虚假的简化形式。它同时既可以解释为什么欧洲会出现价格膨胀，也否认了重商主义关于货币是惟一真实的财富的观点。然而，必须应该进行强调的是，货币数量论并不需要达到上述任何一个目标。斯密，尽管对休谟的观点很熟悉，但他宁愿采取其他人的观点。在对重商主义的批判中，他谨慎地避免运用休谟的数量理论。^⑦由于欧洲价格膨胀、贵金属价格下降、在新世界发现的富矿和通过奴隶制对土著居民的剥削同样可以解释价格上升，而不需要求助于数量论。

休谟的数量理论观点很快就受到了斯图亚特的批判。斯图亚特(1767年，第2册，第27章)认为，货币流通是商品与货币相交换的一个持续不断的通道，这一过程代表着社会各大阶级之间的基本的交换。如果在社会各阶级之间不存在这种相应的交换，消费将会受到限制，“勤奋”将受到损害。因此，“政治家”——这是一个斯图亚特政治经济学的代表性观点——就必须监督经济活动，并确保所有的人都能获得食品和必需品，“在他考虑的所有问题中，都应该在所有的时间里，在工业生产和流通中的等价物的数量之间维持一个适当的比率，以便于对它的购买”(同上)。政治家必须了解富人的边际消费倾向、穷人的勤奋意愿并考虑包括边际消费倾向与勤奋意愿在内的流通中货币的比例。在这一方面，金属货币是存在着问题的，因为只要人们没有消费的意愿，他们就会将货币贮藏起来，并使其从流通中消失。换言之，金属货币会造成国内货币的不充足，实际上会阻碍工业的增长。为了刺激“勤奋”，“政治家”必须要把贮藏的金属货币挤出来。然而，值得庆幸的是，“政治家”可以依靠银行所创造的货币。斯图亚特把这一

过程称之为，“实物财富的融化过程”。这是指，通过银行流动负债发行而取得的流动资产的数量（对此，我们将在以后进行详细讨论）。因此地主阶级就会增加其消费并刺激工业生产。

斯图亚特文风冗长，同斯密相比，他并不善于建立体系。例如，虽然他依赖信用纸币来对流通过程进行分析，但他只是在其著作的非常后面的部分中才对这种货币的性质进行讨论。他对流通的分析概念混乱，他认为商品的持久性代表着价值。然而，同休谟相比，这种分析具有动态的和“现代的”感觉。他对休谟的货币数量论的总结性否定是一个极为深刻的见解，值得引用如下：

每一个国家的流通……必须永远与居民的产业、与能够进入市场的商品生产保持适当的比例……因此，如果一个国家的硬币降到可以用于售出的工业产品的比例以下，产业本身将会停止；或者一些创造物，例如符号货币，将会产生，为其提供一个等价物。但是，如果发现货币超过了产业的比例，它对价格上升将不会产生影响，它们不会进入流通领域，它们将在国库中被贮藏起来，在那里，它要一直等到，不仅仅是财产所有者希望消费的呼唤，而且勤奋对于这一呼唤满意时为止（同上，第 95 页）。

这是一个建立在金属货币贮藏、对信用货币的内生创造能够适应流通的需要以及货币非中性基础上的对于货币数量论的毫不妥协的批驳。在回答休谟关于流通中货币数量急剧减少只能导致价格下降的观点时，斯图亚特（同上，第 98 页）认为，如果纸币被取消，产业就将会崩溃，直接交换本身会迅速代替

被摧毁的货币交换。价格的确将下降，但不会维持其与货币数量的原始比例。而且，从广义来讲，在一个自由的功能健全的市场上，货币不是一个“商品的代表”。只有在“政治家”可以通过管理所有的商品和消费，并清楚了解它们的比率关系，进而可以直接“指挥所有的流通运行时”，这才是一个可行的想法。最后，斯图亚特认为，不可能根据货币数量任意变化的假设，得出关于价格的任何结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能会变成消费者需求的扩张，而货币数量的下降必然会导致产业的下降和失业的上升。

斯图亚特关于货币流通的另外一些重要见解必须应该在这里述及。因为，它们在本书的后部对于货币数量论的批判中，包括马克思和银行学派的批评，将重复地出现。与货币贮藏一样，斯图亚特（同上，第 4 册，第 255~256 页）强调，货币支付债务实际上所造成的一种形式的货币流通的上升与单纯的商品交换是非常不同的：

我们必须区分必要的和自愿的流通。必要的流通表现为债务的支付，自愿的流通表现为对其目标的购买。我们说，当某人欠人钱时，他或者是破产，或者必须进行偿付，只要这个国家还有一个先令……通过禁止货币在流通中的使用——有时银行会这样做的——购买可能会停止，但支付从来不会。

后来，马克思（1867 年，第 232~240 页）也同样强调了债务支付的这种强制性、义务性特征。这种特征对于一个拥有波动性和可管理性银行纸币的国家来讲，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这

一观点同斯图亚特关于货币流通的全部观点是非常一致的：休谟做了一个关于无差异的各种商品和与之相对应的同样无差异的各种货币的假设。斯图亚特（1767年，第4册，第19章）区分了：（1）硬币的国内流通，（2）银行发行的纸币的国内流通，（3）国际收支，即货币的国际流通。斯图亚特（同上，285页）指出，“这三种货币在性质上是绝不相同的，它们受不同规则的影响。”换言之，硬币和信用货币根据其他的原则来流通，而货币并不以流水在水管中寻找相同的水平的方式，在世界各国之间运动。与特别单独强调货币的流通手段的休谟相比较，斯图亚特的分析更为丰富，他讨论了货币作为计算单位和支付手段、贮藏手段和国际转移支付手段的作用。马克思对于货币的功能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斯图亚特的著作。

1.1.3 “流通渠道”

在任何一个特定阶段，商品交换领域中都必须要保持一定的货币量，是古典经济学家的特征性观点。^⑧必要的货币量依靠商品的价值、货币的价值和货币的流通速度。斯密（1776年，第1册，第210页）对此有着一个非常著名的比喻，就是“流通渠道”。斯密认为，当一个国家变得较为富裕的时候，流通中的硬币的数量会“由于需要”而增加。如果，“流通渠道”中的金属货币量多于“必要量”，货币就会“泛滥”。这是在分析信用货币时经常使用的一个人概念。另外，斯密还认为，形成“流通大轮”的金属货币明显地并不构成社会收入的组成部分，而仅仅作用于构成净收入的工资、利润和租金的增长。然而，减少金属货币却会对劳动力造成影响，因此，代表着社会纯收入的净减少。与休谟不同，斯密（同上，第2册，第313

~314 页)赞成银行发行纸币,因为它可以提供低成本的流通手段;类似一种通过空中的马路”。

大卫·李嘉图,最擅长建立模型的经济学家,以斯密相同的思路分析了货币的“必要量”,但他的分析更为准确。李嘉图(1817年,第18~20页)区分了在斯密那里混淆不清的两个概念,即被支配的劳动价值和被物化的劳动价值。他否定了前者,并确定了物化的劳动价值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最终地位。^⑨货币的价值如同所有其他商品的价值一样,具有不同的性质,是由物化在它的生产之中的劳动来决定的(李嘉图,1810年,第2页)。如果世界上仅有金属货币的流通,要想实现均衡,每一个国家都必须拥有一个由完成国内支付的数量与频率来决定的货币量。这一“必要”量随着流通中商品价值的总量(或支付价值总量)而呈正比例变化,同货币金属的价值呈反比例的变化,同“影响这些支付(货币流通速度)的经济活动规模”呈反方向变化(李嘉图,1916年,第55~58页)。这里的问题是,在何时流通中实际货币量会偏离“必要”量?对此,李嘉图采取了与斯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采用了休谟的货币数量论。

李嘉图讨论的货币数量论的背景同休谟的数量论背景有着很大的区别,包括1797年后对英格兰银行所发行的纸币兑换黄金的限制和随之而来的关于金本位的讨论。虽然李嘉图理论要旨同休谟的非常相似,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例外是,李嘉图认为,货币(和商品)具有由劳动决定的内在价值。在李嘉图的分析中,货币的内在价值可以同休谟的货币的“虚拟价值”相对应,即它是商品总量同货币总量(价格水平的反比例)相交换的比率。李嘉图用一种巧妙的方法来调和这两种价值。^⑩

如果世界上所有的货币都是由金属构成的，在均衡点，每一个国家都必须使“必要”的货币量同交换领域保持一致。所以，李嘉图认为，“必要”的货币量是由货币价值、商品价值和流通速度来决定的，它不允许在均衡状态下，货币内在价值与商品的内在价值之间的交换比率存在着不一致。另外，如果全球都处在均衡的状态下，货币与商品的内在价值也将普遍存在。这样，国家之间交换货币的经济动机也就不存在了，国际间的交换将仅仅涉及商品的流动。国际均衡是贸易均衡，贸易实际上是商品同商品的交换。假设其他条件不变，对均衡的冲击，例如新的金矿的发现、银行印制更多的货币，就会带来一系列更为复杂的事件。根据休谟的假设，国内货币数量的上升，在开始阶段会降低相对商品的货币价格。由于货币金属的内在价值在世界范围保持不变，所以，为了能够获得利益，金块会被出口到国外，硬币所有者可以将其熔化为金块，并输往国外，这种行为会造成本国外贸赤字，降低本币对外币的交换比率。然而，这还会导致国内货币数量的减少，并将渐渐地重新实现均衡：货币相对于商品的价值再度同货币的内在价值相一致。如果流通中的货币量少于“必要”的货币量，相反的情况就会发生。

纸币（李嘉图并没有区分银行发行的纸币与国家发行的纸币），只要它可以完全地兑换成黄金，就不会影响这一自动机制。如果最初的冲击产生于银行增发的纸币，纸币的所有者可以直接把它们兑换成硬币，然后将其熔化，输出国外。然而，不可兑换货币的情况确并非如此。这种货币的增加会把硬币驱逐出流通领域，并导致货币兑换商品比率的扩大，永远低于货币金属的内在价值。因此，本币同外币交换的比率也会相应地

下降。与休谟不同的是，李嘉图并不反对纸币，他的分析设定纸币是可以兑换的。的确，他强调，实际上纸币比硬币更具有优越性，因为对它的数量可以精确地进行控制，从而形成一个商品同货币交换的稳定的总比率（李嘉图，1816年，第57页）。

由于李嘉图的理论的基础在于硬币可以自由并不断地持续兑换成金块，反之亦然，所以它不允许以任何理由持有非流通的贮藏货币。同样，该理论也不能解释为什么商品所有者特别需要货币交换他们的商品，而不是任何其他商品。如果交易者发现，在经营过程中，并非处于盈利动机，而去使用和贮藏货币，那么货币就是特殊的商品。然而，李嘉图对劳动价值论与货币数量论的调和使他可以假设货币是许多商品中的一种一般商品。

然而，实际上货币确经常被贮藏，并明显地出于同贸易者的套利收益不相关的原因而在国家之间流动。例如，当一国出现歉收的时候，货币就会专门用来购买急需的食品，或者专门用于支付国际债务。这实际上是斯图亚特在批判休谟所强调的货币运行的方向。然而，李嘉图没有把这种现象吸收到他的理论分析之中去，并攻击想要这样做的其他人。他要求桑顿（Thonton）解释为什么外国会拒绝接受英国的商品，而要求支付货币（李嘉图，1810年，第61页）；他不理解波桑奎特（Bosanquet）的关于在收成不佳时，英国“不得不”进口玉米的建议（李嘉图，1811年，第208页）；他迷惑马尔萨斯的感觉，因为马尔萨斯感觉到，而非认识到，在这方面存在着某些缺陷（李嘉图，1951年，第26页）。在李嘉图的货币数量论中一贯坚持的观点是，货币仅仅是单纯定额交换手段。